



诗经



阐释史

文

学

汪祚民 著

(先秦—隋唐)

人
民
出
版
社



诗经



文学

阐释史

汪祚民 著

(先秦—隋唐)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伍 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文学阐释史 (先秦—隋唐) / 汪祚民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

ISBN 7-01-005127-5

I.诗… II.汪 III.诗经-文学研究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8404 号

诗经文学阐释史 (先秦—隋唐)

SHIJINGWENXUECHANSISHI

汪祚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3

ISBN 7-01-005127-5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序

霍松林

汪祚民君的博士论文《〈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特来信求序。作为导师,我乐意讲几句话。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诗经》被奉为政治教化的经典,《诗经》的阐释,长期以宣讲义理的经学阐释为主,其文学阐释处于零散的边缘化状态。直到“五四”以后,《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的文学身份才得到正式确立,与之相应的文学阐释才逐渐成为《诗经》阐释的主体。《诗经》文学阐释的这种历史境遇,不仅容易导致学术界对它的忽略与疏离,也给全面总结其发展演变过程带来许多困难。近年相继问世的《诗经》研究著作,或较少关注《诗经》的文学阐释,或局限宋明以后一些文学性较强的《诗经》阐释个案的探讨,就证实了这一点。既然《诗经》的文学身份已经确立近一个世纪,新时代的《诗经》文学阐释需要在充分吸取历代研究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从《诗经》的文学身份和文学视角,系统、深入而详尽地研究《诗经》文学阐释发展史及其与经学阐释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诗经》学的历史必然。祚民所研究的正是这一难度较大又具有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的课题,本书就是这一课题的阶段成果。

在《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中,学术界之所以特别关注宋、明一段,甚至把宋、明视为《诗经》文学阐释的起始和《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发展的转折点,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

传统意义上的《诗经》文学阐释资料开始丰富起来,与此前零星稀少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书的突出特点乃在于突破了这种观念和学术成见,另辟蹊径,细密详尽地论述了先秦至隋唐《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状况。首先,打破了《诗经》经学阐释与文学阐释绝对割裂的观念,深入经学内部,发掘其文学阐释的内容。《毛序》、《毛传》、《郑笺》、《毛诗正义》这些典范的经学阐释文本,在现代《诗经》文学身份确立的过程中,常常被视为掩盖《诗经》文学风神和个性特征的异化物而遭到批判与废弃,系统阅读的人日见稀少。祚民在认真细致地研读这些传统经学阐释文本的基础上,披沙拣金,论述了《毛传》独标“兴”体、《毛传》《郑笺》对《诗经》作品的情感体悟与评点、《毛诗正义》对《诗经》作品的艺术鉴赏和对《诗经》句法章法的集中总结等文学阐释事象,揭示了《诗经》经学阐释与其文学阐释既有阐释方向上的对立,又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为《诗经》文学阐释的定位奠定了根基。其次,《诗经》作为我国的文化经典和最早的文学总集而被历代作家取资化用的事例随处可见,但对于文学创作中的《诗经》接受,一般只从《诗经》艺术影响或作家艺术继承的角度偶尔谈及。祚民此书,则用现代阐释学的理念审视先秦至隋唐文学创作中的《诗经》接受,考察了宋玉辞赋、《焦氏易林》、魏晋南北朝诗赋、李杜诗文对《诗经》作品的深情感悟和审美化用,阐发了深寓其中的文学阐释的丰富内涵,呈现出新颖的视角。其三,从片言只语和平凡的论说中探寻《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踪迹。秦汉之际《国风》与《小雅》的标举,魏晋风流与谢氏家族的品《诗》,钟嵘《诗品》将《古诗十九首》、曹植与阮籍的五言诗从风格上溯源至《国风》和《小雅》,萧纲的《诗》评与《国风》专著等,尽管只是一些零星而不起眼的资料,但从文学阐释的角度看,却弥足珍贵。然而仅在个别文论著作中间有

引述,在《诗经》学研究中则多被忽略。而祚民以特有的学术眼光观照这些论说,并进行了重点挖掘,展现了《诗经》文学阐释发展的生动景观,也显示出较强的对零散资料的整合能力。此外,还从《汉书·艺文志》提出的《诗经》“本义”问题、班固的采诗民间说与他对《诗经》所作的风俗史考察中揭示其《诗经》文学阐释的理论意义。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与总结,不仅大大充实了《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空间内涵,而且得出了一些创新性的结论:文学阐释是《诗经》的本体性阐释,是《诗经》经学阐释的基础,始终与之相伴而行;在先秦至隋唐由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所构成的文学活动中,《诗经》的文学阐释一直是相对独立地演进与发展。这些新的结论颇具说服力地纠正了以宋明为标志来勾勒《诗经》阐释“从经学到文学”的发展轨迹的论说,大大开拓了《诗经》文学阐释的理论视野。

学术研究贵在扎实深入,论证严密到位。祚民此书在这方面颇有特色。在描述历代《诗经》文学阐释之前,专辟一章,集中探讨《诗经》作品的原生形态与文学特质:进一步审视和确证了具有文学阐释意义的国风出于民间说,对有关此说的诸多质疑所存在的问题予以辨正;尽力复原《诗经》作品最初寓于歌唱、与乐一体的文本存在形式,探讨这种情绪化的艺术文本的功能与其本义显现出的特征;还从《诗经》作品诗人自白的话语中,揭示《诗经》的艺术特质。这就为证实《诗经》文学阐释是其本体性的阐释,为进一步研究《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历史,确立了理论基点。在具体论述《诗经》文学阐释发展过程中,并不局限于历代《诗经》文学阐释事象的平面罗列,而是尽可能将这些事象放入纵横交叉的历史坐标中进行定位考察,探究其渊源与影响,评论其阐释学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不仅准确地勾画出《诗经》文学阐释史的鲜明轮廓,而且富有立体感。鉴于《诗经》经学阐释是“五四”之前的主体性阐释,此书始

终注意《诗经》文学阐释与经学阐释的关系,在这种互文对比的背景中展示文学阐释的发展历程。正是基于由此及彼、探微抉奥的探讨,使得此书深入到经学、史学、文献目录学、文艺学与美学等广泛领域,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扎实的理论学养。

此书只写到隋唐,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将全部《诗经文学阐释史》写完,为新世纪《诗经》文学本体研究提供全面而系统的学术史线索和历史借鉴。

绪 论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我国经学赖以生成的文化元典之一。《诗经》自其创作问世开始，就承担着重要的文化角色，人们对它的评论也随即展开，形成了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的《诗经》阐释史。历代关于《诗经》的阐释著作汗牛充栋，涉及《诗经》文本各个方面的问题，但决定研究方向的不外是其中的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其他如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章、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被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所统摄，为其服务。

一

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诗经》文学阐释史是与《诗经》经学阐释史相对而言的，两者的区别是由于《诗经》既是诗歌又不是普通的诗歌这一特殊的文化身份决定的。在正式进入具体研究之前，有必要对《诗经》文学阐释和经学阐释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和把握。

《诗经》的经学阐释就是以经学的立场、经学的目的和经学的原理对《诗经》文本所作的审视、解读和评说。何谓经学？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儿宽传》，朱维铮先生对它作了个定性的界定。他说：“它特指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具体地说，它特指西汉以后，作为中世纪诸王朝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学说。因而，倘称经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它曾经支配中国中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二、它以当时政府所

承认并颁行标准解说的‘五经’或其他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三、它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即在实践领域中，只许信仰，不许怀疑。”^① 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立五经博士之后，勃然兴起，成汉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皮锡瑞《经学历史》对汉代的经学作了描述：“汉人知孔子维世立教之义，故谓孔子为汉定道，为汉制作。当时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为弘亮洪业、赞扬迪哲之用。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② 此后经学虽有兴衰沉浮，但作为历代封建统治学说及其理论资源的法定地位并没有改变。《诗经》是经学的重要元典，被视为统治学说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这就注定了汉至近代以前历代《诗经》阐释的主体是经学阐释。《诗经》经学的阐释特点，就是大多忽略诗中的情感审美和表现形式，不太注重《诗经》作品的文本意义及其整体把握，通过“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艺文志》）的说解，阐发其中各诗的美刺讽谏意义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政教价值。

《诗经》的文学阐释是指从诗歌本位的立场和审美观点对《诗经》情感特质、表现手法、语言形式以及对后世诗歌的艺术原型作用等予以揭示、评论和诉诸情感的鉴赏。“文学”一词，早在“经学”一词出现以前就已存在。《论语·先进》有“文学子游、子夏”一语，其中“文学”的含义为“文章博学”。特别是汉代，文学的概念涵盖了经学，如《史记·儒林列

^①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传》曰：“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诗经》文学阐释的界定。其一，文学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郭绍虞先生说：“孔门以文学包括文章博学二义，至两汉则文是文，学是学，然其论文学者，仍有博学之义。直至南朝，于是文学一名，即是文章之义”。“宋文帝命雷次宗立儒学，何玄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以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称，则文学之义，也有脱离学术的倾向了。”“但从此以后，一般人对于文学的观念复为复古思潮所笼罩，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不惜再为逆流的进行，而传统的文学观遂于以形成。”^①今天使用的文学概念不是我国本土“文学”概念的历史发展演化，而是直接从西方引进的。鲁迅《门外杂谈》说：“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做‘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夏子游’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 Literature 的译名。”^②其二，“文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学包括一切语言文学作品。例如近人章炳麟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③近代英国第一流批评家（Mathew Arnold）说：“文学是一个广大的词，那是可解为用文字书写或印刷在书籍上的东西。”^④他们说的都是广义的文学。狭义

① 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郭绍虞说文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7页。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③ 章炳麟：《文学总略》，舒芜等，《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20页。

④ 姜亮夫：《文学概论述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文学指今日通行的文学，即包含情感、虚构和想像等综合因素的语言艺术。梁代萧绎《金楼子·立言》：“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近代美国（T. Heodare W. Hunt）教授说：“文学是思想的文字的表现，通过了想像、感情及趣味，而在使一般人们对之容易理解并且惹起兴味的那样非专门的形式中的。”^① 韦勒克·沃伦认为“‘虚构性’、‘创造性’、‘想像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②。这些说的都是狭义的文学。正是因为文学概念的复杂性，至今还没有一个最权威的定义。我们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要了解这一事实，根据不同研究对象，灵活运用。当我们在与《诗经》经学阐释相对的背景下，提出《诗经》文学阐释的命题时，完全可以用狭义的审美的文学观去考察《诗经》的阐释，甚至从《诗经》经学阐释中勾稽遴选出文学阐释的内容。

经学阐释是近代以前《诗经》阐释的主流，那么《诗经》文学阐释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呢？早在汉代经学兴盛时代，刘向父子和班固已经意识到今文三家诗说“咸非其本义”，这就意味着另有一种合乎“本义”的阐释。他们还说《诗经》是“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的产物，《诗经》本义的阐释或许是指向这一方面的。宋代朱熹也有这种认识。《朱子语类·诗一》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纔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③ 朱熹将矛头直接

① 姜亮夫：《文学概述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②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页。

③ 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6页。

对准权威的经学诗说《毛诗序》，意在以今人之诗去观照《诗三百》，从“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角度去认识和解说它。而“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正是诗歌的艺术本质，由此来认识说解《诗经》，亦即《诗经》文学阐释的一个重要标志。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孙月峰评经》时说：“经本不可以文论，苏洵评《孟子》，本属伪书；谢枋得批点《檀弓》，亦非古义；乃竟用评阅时文之势，一一标举其字句之法，词意纤仄，钟谭流派，此已兆其祖。”《孙月峰评经》包括《评诗》四卷。四库馆臣站在经学的立场，指责此书以标举字句的评点方法评《诗》《书》等经，等于指出了《孙月峰评诗》是“以文论经”的《诗经》文学阐释著作。当今学者蒋立甫教授认为欧阳修是《诗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①，莫砺锋教授认为朱熹是《诗经》文学研究的重要人物^②，刘毓庆先生的博士论文就是将明代的诗经学分为经学和文学两个部分论述的，故题为《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因此，《诗经》文学阐释这个命题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前，又为古今学者明确承认，且都是在与经学阐释相对立的背景中提到的，这一命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诗经》的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在阐释方向上是对立的，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联系。一方面，《诗经》三百篇毕竟许多是吟咏情性的诗歌，出自心灵深处，也易于打动人心。对此，《毛诗序》作了生动的描绘：“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

^① 蒋立甫：《欧阳修是开拓〈诗经〉文学研究的第一人》，《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莫砺锋：《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实质》，《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而且用极其夸张的语言说“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表明经学家对《诗》中情感认识比较深入，只是其阐释立场和目的不在诗歌情感审美本身，而是利用诗歌感人情志的特点作其政治教化的理论发挥。《诗经》的语言许多不是科学实用的语言，运用了比兴的表现手法，经学家也得其会心，如《毛传》对《诗》中的兴体一一作了标举，只不过在具体解说中作了符合经学目标的转换。另一方面，《诗经》经学阐释重视政治教化功能，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种阐释思维与方式；且《诗经》也并非全是兴象玲珑的情性之作，也有歌功颂德的应时之篇。陈良运说得好：“由《风》《小雅》而《大雅》《颂》，诗的审美情感等特征就已表现出由强而弱乃至消失，诗的艺术感染力由浓郁而逐渐淡化”，“功利的追求从无到有而至强化”^①。对于那些审美情感较弱、艺术感染力较淡、功利的追求较强的《雅》《颂》之诗，其语言也较质实清晰，经学的说解不少与之相符。鉴于《诗经》经学阐释和文学阐释这两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在考察《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时，不可能将经学阐释抛在一边，而要深入其中，挖掘出文学阐释的丰富宝藏。

二

《诗经》研究，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诗经》文本进行直接的阐释，一是对前人《诗经》阐释的归纳总结。前者是对《诗经》文本价值和意义进行新的读解，后者是《诗经》

^① 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

文本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存在。后者为前者提供研究坐标和理论指导，前者为后者储积新的资源。只有两者协调发展，《诗经》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才能提高，知识信息总量才能相对地增长。作为从情感审美角度切入的《诗经》文学研究自然也应包括这两个层面，即《诗经》的文学阐释和《诗经》文学阐释史。

中国《诗经》研究，历史悠久，著作如林。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和《明代〈诗经〉著述考目》^①分别著录《诗经》研究著作 564 种和 650 多种。又《清史稿·艺文志》著录《诗经》类著作 176 部，除去清人辑佚的前人著作 38 部，清人著作共 138 部；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清人《诗经》学著作 215 部；王绍曾、章钰《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录《诗经》著作 370 部，除去清人辑佚的前人著作 55 部，清人的著作 315 部。这三种书目共著录清人《诗经》学著作 668 种，是以往历代之冠。寇淑慧《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著录有关著述论文达 5729 项，除重复，也不少于 5000 项。如此众多的著作构成了《诗经》阐释史的历史长河。面对如此丰厚的《诗经》研究遗产，学术界正在进行清理和总结。目前已经出版的《诗经》阐释史研究著作有胡朴安《诗经学》、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李家树《传统以外的诗经学》《诗经的历史公案》；本世纪刚问世的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戴维《诗经研究史》、洪湛侯《诗经学史》和一些博士论文，如：郝大敏《宋代诗经文献学》、王承略《两汉诗经学史》、檀作文《朱熹诗经学研究》，等等。《诗经》文学阐释在经学阐释占主流的清代以前，一直处于零

^①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附录，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 440—459 页。

散、边缘的状态；只是现代以来，才得到大大加强。与之相应的《诗经》文学阐释史研究更为薄弱，除了散篇的论文和上述著作的有关章节外，还有郝志达《国风诗旨纂解》、张树波《国风集说》、蔡守湘《历代诗话论诗经楚辞》的《诗经》部分等《诗经》文学阐释的资料汇编和几篇博士论文，如龙向洋《“诗”与“经”的张力——明清之际诗经文学点评》、邹其昌《朱熹诗经美学研究》，尚无全面贯通《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著作。在进行这样的学术考察之后，我定下了本文的选题，尝试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深入而详尽地描述《诗经》文学阐释发展的历史及其与经学阐释的关系，为新时代《诗经》文学本体研究提供全面的学术史线索和历史的借鉴。

《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不仅有提供学术史考察和借鉴以推动《诗经》研究、提高其学术水平与质量方面的意义，还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西方的文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都强调这种独立的价值。《诗经》文学阐释史实际就是《诗经》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史。按文学阐释学的观点，《诗经》文本如不经过阅读阐释，顶多是一堆死的文献，只有通过阐释者对它解读阐释，它的艺术风貌才能呈现出来。不同时代的阐释者都是以当代的审美视野对它进行自我阐释以显示其当代性，《诗经》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就在不断的理解和阐释中得到完善和发展，永无止境地显现当代价值，构成穿越时空的永恒。按接受美学的观点，历代读者是《诗经》作品的直接承受者，《诗经》作品的审美意象和表现形式有赖于读者完成。《诗经》文本与读者发生关系之前，它只是第一文本的自在之物，只有当它进入阅读程序，才转化为第二文本，与读者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趣味融为一体，此时的文本才能形成审美空白和不确定性由读者去填补，形成召唤结构由读者去响应，形成期待视野由读者去

选择和刷新,《诗经》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美学接受与生产的阐释过程。如《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在东晋以前,并没有人称誉。东晋谢玄独具慧眼,激赏不已,视之为《毛诗》之中最佳句子。此后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阐发其中的艺术奥妙。刘勰指出其“依依尽杨柳之貌”的写物之工;宋代宋祁欣赏其中“写物态,蔚人情”,人情物态交融,景语即情语的艺术境界之美;明代谢榛将“昔我往矣”四句推为隔句对或扇格对的最早祖例;清代王夫之会心妙悟其中“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的反衬手法和由此带来“一倍增其哀乐”的更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自东晋到清代的这些阐释,既是《采薇》诗句艺术神韵不断呈现开放的过程,又是读者和评论家审美意识和鉴赏能力不断深化和增强的历史。《周南·卷耳》一诗,毛、郑解说迂曲难通,将本有章法之诗弄得支离破碎,毫无诗意可言。朱熹《诗集传》在批驳《序》、《笺》的同时,悟得其构思,说首章是“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下三章“托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明代杨慎结合原诗,审视朱说,认为妇人登山携仆、饮酒望远等举动不符合其文化身份,“虽托言之,亦伤于大义”,于是稍加驳正,说下三章皆后妃想像中的文王在外跋山涉水、酌酒解忧的情景,若后世诗词所谓“计程应说到梁州”^①,诗中韵味初显,诗的构思技巧初步得到揭示。清代方玉润将此诗主人公由朱、杨认定的后妃降为普通妇人,以诗为妇人念夫行役之作。“下三章从其对面着笔历想其劳苦之状”,

^① 杨慎:《升菴诗话》卷7,《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0—781页。

后世杜甫“今夜鄜州月”一首，脱胎于此^①。如此解释，情趣更足，更符合诗中主人公的身份。当今钱钟书先生涵泳文本，匠心别出，说此诗主人公乃妇与夫两人，首章之“我”与下三章之“我”人各异地，相互思念，如同尾批家谓之“双管齐下”，章回小说谓之“话分两头”。鲍照《东门吟》：“居人掩闺卧，行客夜中饭”；陈陶《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均此手眼^②。《卷耳》在历代的阐释中，主人公由后妃到妇人，由一人到两人，构思从托言到想像到相互思念，经学色彩渐渐淡出，艺术的精妙一步步展开，阐释者的审美眼力节节攀升。总之，《诗经》的文学阐释史有其独立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对其研究总结，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

《诗经》文学阐释在其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先秦是《诗经》文学阐释的萌芽时期。《诗经》的早期阐释寓于说理引《诗》、外交赋《诗》和仪礼歌《诗》。其中最为完整的阐释《诗经》的模式表明当时人们对《诗经》阐释是从解读作品原文本义、情韵开始的，情感审美的阐释不可避免。《左传》记载楚国申叔跪所言“《桑中》之喜”表明当时士人对《桑中》情歌的把握倾向的确不是“淫”或“刺淫”的道德评判，而是从原诗文本出发得到的“喜”的情感体悟。晋韩宣子

① 方玉润：《诗经原始》（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页。

②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第67—70页。